

蒋玉斌 著

明代中晚期

小说与士人心态



蒋玉斌 著

明代中晚期

小说与士人心态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蒋玉斌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7

ISBN 978-7-80752-590-5

I. ①明… II. ①蒋…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明代 ②士—心理状态—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I207.41 ②D6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8397 号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

míngdài zhōngwǎnqī xiǎoshuō yǔ shìrén xīntài

蒋玉斌 著

-
-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6.375
字 数 16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590-5
定 价 14.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之密切关系	(8)
第一节 明代中晚期：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	(8)
第二节 明代中晚期士人复杂心态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20)
第三节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存在着必然联系	(32)
第二章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慕俗心态	(39)
第一节 士人的慕俗心态：明代中晚期小说的新变	(39)
第二节 明代中晚期士人慕俗心态产生的原因	(52)
第三章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淑世心态	(68)
第一节 士人的淑世心态：明代中晚期小说的固守	(68)
第二节 明代中晚期士人淑世心态产生的原因	(87)
第四章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自恋心态	(103)

第一节 士人的自恋心态：明代中晚期小说“自我”认同的极致	(103)
第二节 明代中晚期士人自恋心态产生的原因	(130)
第五章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泄愤心态	(156)
第一节 士人的泄愤心态：明代中晚期小说的情感宣泄	(156)
第二节 明代中晚期士人泄愤心态产生的原因	(172)
赘 语	(186)
主要参考文献	(188)
后 记	(198)

导 论

如果从创作者角度来对文学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类。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文人文学占有绝对优势，处于文坛的主流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史就是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发展史。因此，要深入研究古代文学，士人心态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罗宗强先生自述在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时候，由于对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黯而不明”，于是产生了探讨魏晋士人心态的想法。也就是说，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是研究魏晋文学思想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士人心态对于深入研究古代文学来讲是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但士人心态却又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士人心态研究的是士人的内心世界，而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相当隐秘的、复杂的、多变的心灵世界。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又往往存在“文不如其人”的现象，如明代的陈继儒屡被荐举，坚辞不就，年二十九就隐居小昆山，写有《小窗幽记》等闲适作品，却又周旋于官绅间，被蒋士铨讥为“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种“文不如其人”的现象只能存在于单篇作品之中，所以，左东岭先生指出了研究士人心态的整体性原则，他说：



“指出文不如其人，并不是说诗文作品就不能作为心态研究的文献来使用，作家在某篇作品里可以把自己真实的看法、思想与情感隐藏起来或进行修饰，但通过他的全部作品，依然可以探讨出他基本的思想情感”，“从群体心态研究上说，文如其人的原则依然是成立的”^①。可见，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再结合其他历史文献，通过认真的思辨和感同身受的对作品的理解，是可以触摸到最接近真实的士人心态的。

影响士人心态的因素是很复杂的。罗宗强先生认为主要有三个：政局的变化、思潮、士人的生活出路，除了这三个最重要的要素之外，还与家庭的文化传统、社党的组合、交往、婚姻状况、个性等等有关^②。依此观点，士人心态最为复杂的时代肯定是政局十分动荡、思潮十分活跃、士人的生活出路十分多样化的时代。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时代最突出的有两个：魏晋和中晚明，尤其以中晚明为盛，这两个时期的士人心态无疑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研究的。罗宗强先生指出了这两个时期整个士人阶层的巨大变化：“就整个士阶层而言，则大体循传统思想而行事，未见大震撼于士林。只有魏晋和晚明，似乎是两个有些异样的时期。士（或者说是那些引领潮流的士人）的行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离习以为常的传统了。”^③ 实际上，并非仅仅是晚明，明代中期的士人就已经开始背离传统了。确实也有学者重

① 左东岭：《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与意义阐发》，《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② 参见罗宗强：《因缘集：罗宗强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

③ 同上，第12页。

点关注明代中晚期的士人心态，如左东岭先生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就深入分析了明代中晚期心学的复杂历史走向及其对士人的人格心态、中晚明的政治格局、文学思想等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能否以明代中晚期小说为基本材料来研究士人心态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明代中晚期小说的编创都有着当时士人的参与，他们的心态必然或隐或显地通过小说表现出来。当然，明代中晚期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如《西游记》、“三言”等经典小说，虽然这些小说的故事题材在民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流传，打上了很深的民间文化的烙印，但最终还是经过小说最后写定者之手，才完全定型的，因此也必然表现出充满个性的士人色彩，士人心态也同样隐隐可见。也有部分学者否定这些作品的士人色彩，如徐朔方先生在谈到明代四大奇书的时候所提出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出于谁的手笔。任何一个说书艺人都继承原有的模式或版本而有所发展（即或大或小的标新立异）。所谓发展，既有精心的有意修改，也可以是无意中的逐渐失真或走样。同样，任何一个出版商都可以请人重写、润色或照本翻印，而在翻印中有所提高。并不是每一个说书艺人、每一个出版商都只会越改越好，而不会改坏。改好改坏两种情况，甚至比例不同、得失参半的多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在这里同样发生作用。我把这

种型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①

徐朔方先生充分肯定了说书艺人和出版商对四大奇书的成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但基本上否定了这些小说的最后写定者的作用，也即否定其中的士人色彩。因为这些说书艺人和出版商人员众多，又无法确定其姓名和身份，徐朔方先生故名之为“集体”。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古代小说的一些特质，但这个观点对于读者解读和阐释每一部具体小说作品来说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此观点均衡地看待不同时代的不同参与者的作用，从而否定了最后写定者的集大成作用，这导致读者认为这些早期古代小说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作品”；“其二，此观点强调集体创作，过分关注古代小说的民间性，从而忽视了这些小说的充满个性的文人色彩，这导致读者不能深入理解蕴涵于小说文本之内的深厚情感和深刻寓意以及其独特的艺术特征”^②。其他文人独创小说，如《西游补》^③、《鼓掌绝尘》等，其中的士人色彩更不必说了。因此，从明代中晚期小说来观照士人心态是切实可行的。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选择了“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作为研究对象。主观上当然与笔者对古代小说的特别喜爱有密切

① 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② 蒋玉斌：《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检讨》，《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的《西游补》注明为清代作品，实不当。董说生于1620年，卒于1686年，疑如居士为《西游补》所作的《序》的写作时间为“辛巳中秋”，辛巳年为1641年。《出版说明》中亦说：“从他所作《漫兴》诗来看，他写作《西游补》还在明亡以前，年仅二十一岁。”因此，将《西游补》视为明代作品更为合适。

关系。小时候，经常骑在牛背上，手里拿着一本连环画，或《三国演义》，或《水浒传》，或《西游记》，或《明英烈》，或《说岳》等，牛儿悠闲地吃着草，笔者也被诸葛亮、武松、孙悟空、胡大海、岳飞等人物所深深吸引，直至暮归！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至今仍然萦绕于脑海！但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浩如烟海，要宏观把握，实非自己所能，只能选择其中特定期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客观上也因为明代中晚期的小说与士人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独特性，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明代中晚期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是一个典型的动荡时期，但是，动荡时期也往往是一个产生新思想的时期，一个最具有个性的时期。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呈现出了空前的发展态势，反映市民利益的新思想也应运而生，特别是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叛逆思想和个性解放思想对整个明代中晚期的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时文艺领域中的主要革新家，如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士人，都恰好是李贽的朋友、学生或者倾慕者，无不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其二，明代中晚期又恰好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古代小说按照编创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世代累积型小说（如《西游记》）、文人独创型小说（如《红楼梦》）、文人改写型小说（如《隋唐演义》），从小说史的角度考察，明代小说以世代累积型小说为主流，清代以文人独创型小说为主流，而明代中晚期小说则比较独特，既有《西游记》这样的经典世代累积型小说，也有《型世言》这样的优秀文人独创型小说，呈现出世代累积型小说与文人独创型小说并存的局面，并显示出从世代累积型小说向文人独创型小说过渡的痕迹。《金瓶梅》是呈现明代中晚期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独特地位

的一个典范作品，正因为这一点，致使关于《金瓶梅》的编创方式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冯沅君、徐朔方等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世代累积型长篇小说，石昌渝、黄霖等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而霍现俊则认为《金瓶梅》属于一部“准文人小说”^①。而且，这个时期的小说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表现出数量多、质量高、题材广、影响大的特点，在这几个方面同时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其三，明代中晚期士人既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具有最浓厚的封建意识因子，又处于思想自由、个性突出的时代，再加上他们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下层，生活坎坷，物质贫乏，精神悒郁，所以，他们必然具有各种复杂的心态。夏咸淳总结了明代士人的心态历程：“明代士林心路曲折起伏，大致呈现出初期沉寂（袭宋而崇理）、中期振奋（慕古而尚气）、后期飞扬（趋俗而尊情）三种状态，与此相应，文学的发展则形成初期因袭、中期突破、后期超越三个阶段。”^②可以看出，明代士人心态比较复杂的时期正是中晚期。虽然有论者认为明代小说属于市民文学的范畴，但笔者不太苟同，因为每一部小说艺术上的提高以及传播等，实际上都离不开士人的参与，正是他们的参与，才真正使小说逐渐成熟起来，所以可以这样说，明代中晚期小说同样深深地打上了士人的烙印。士人正是辉煌的明代中晚期小说的创作者、编订者和传播者，因而明代中晚期士人的复杂心态必然通过小说呈现出来。

① 霍现俊：《金瓶梅：一部准文人小说》，《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② 夏咸淳：《明代文人心态之律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这样一来，明代中晚期士人的各种复杂心态如何通过明代中晚期小说的创作或编订呈现出来以及这些复杂士人心态形成的原因就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把握这样一个前人做得较少的论题，对于才疏学浅的笔者来说，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冒险。但是既然尝试了，无论怎样，还是努力地做下去！

第一章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心态之密切关系

第一节 明代中晚期：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明代中晚期小说”的时间厘定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推翻了元的统治，接着又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突出特征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明朝。公元 1644 年，李自成率大军攻破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于景山自缢，明朝灭亡。从朱元璋建国到明朝灭亡，前后共计 277 年。对于漫长的整个明代历史，《中国通史》并没有明显的分期，只根据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把明代历史分为“明朝的建立与集权统治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明朝的衰落”两章，明代的学术文化概况放在《中国通史》第十册中与清代文化一并叙述。当然，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定要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它具有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规律。“它（文学）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有时它显得快些，有时慢些，有

时甚至同生产呈反方向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指出这是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①。正因为这种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根据明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以及明代文学自身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明代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中期、晚期。游国恩先生非常明确地把明代文学划为初期（洪武—成化，1368—1487）、中期（弘治—正德，1488—1521）、后期（嘉靖—崇祯，1522—1644），袁行霈先生也表示明代文学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指出具体的年号，但他指出了各个时期文学的特征。关于明代小说的分期，陈大康在专著《明代小说史》中，没有对此进行专门论述，他只是按照小说的发展特点和年号把明代小说分为五编：明初的小说创作（洪武至洪熙四朝，1368—1425），萧条与复苏（宣德至正德七朝，1426—1521），嘉靖、隆庆朝的小说创作（嘉靖、隆庆二朝，1522—1577），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万历、泰昌朝，1573—1620），明末的小说创作（天启、崇祯与南明弘光朝，1621—1645），这五编基本上可视为对明代小说的分期。陈大康对明代小说的分期抓住了明代小说发展的特点，比较准确。从这五个时期来看，明代小说的繁荣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不过，他把南明弘光时期的小说也纳入了明代小说，这一时期计有《剿闯通俗小说》、《清夜钟》、《贪欣娱》、《天凑巧》、《女侠传》、《广百川学海》^② 六部，这些小说数量少、成就也不高，况且部分小说几乎无法判定其创作年代，因此本书不把南明弘光时期（1645）的小

①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②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10—811页。

说纳入考察的范畴。而齐裕焜在其专著《明代小说史》中则把明代小说分为三期：前期从洪武至成化（1368—1487），共 115 年，中后期从弘治至万历（1488—1619），共 130 余年。他对明代后期小说的划分以万历年号作为结束，窃以为不妥，因为这种划分把一些优秀的或重要的明代小说排除在外了，如天启年间（1621—1627）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崇祯年间（1628—1644）的《拍案惊奇》、《辽海丹忠录》、《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等，这样一来，自然不能准确而全面地反映明代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了。孙一珍又把明代小说分为四期：明初，开国至弘治间；明中叶，正德、嘉靖时期；第三个时期，隆庆、万历时期；明末时期，天启、崇祯年间。这种分期也较为符合明代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基于以上关于明代文学与明代小说分期的分析，并结合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与明代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为了更清晰地看出明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本书权且以游国恩先生对明代文学的分期为标准，即将明代小说分为三期：初期（洪武—成化，1368—1487）、中期（弘治—正德，1488—1521）、后期（嘉靖—崇祯，1522—1644）。中期是明代小说的转折期和过渡期，晚期是明代小说的繁盛期，所以一般把中晚期同时视为明代小说的繁盛期而相提并论。通过以上的考察，明代中晚期小说的时间可以厘定为从弘治元年（1488）至崇祯十七年（1644），历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八个年号，共计 157 年。

二、明代中晚期小说繁盛的主要体现

鲁迅认为小说的渊源在于神话，他说：“神话大抵以一‘人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

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① 鲁迅所说的文章当然包括小说在内。杨义承认了鲁迅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小说的源头除了神话以外，还有史传文学和子书。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无论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神话，还是史传文学或子书，都可以称得上源远流长。虽然小说的起源非常早，但由于其文体概念模糊，又处于“小道”、“末道”、“丛残小语”的低贱地位，不能登大雅之堂，未能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因而发展十分缓慢，以致于到了明代，才迎来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小说的黄金时期。更确切地讲，中国古代小说的繁盛应该说是明代中晚期。明初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剪灯新话》等少数作品外，几乎没有其他作品问世。《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艺术水平相当高的作品的问世，并没有带来明代小说的繁盛，相反的是明代小说的创作沉寂了近两百年，直到明代中期以后《西游记》的问世，才真正迎来了明代小说的繁盛。为什么会出现近两百年的空白呢？陈大康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为印刷术的落后与费用高昂、明初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严密高压控制、明初重农抑商的政策是造成这种小说空白的主要原因^②。好在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印刷业的繁荣、商业的发达、官方严厉控制的松动，古代小说终于迎来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7 页。

② 陈大康：《论小说史上的两百年空白》，《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74—83 页。



了它的“春天”，并形成了繁盛局面。明代中晚期小说的繁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数量多。

明代小说多如繁星，以通俗小说为例，据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著录，仅明代的通俗小说就有161种，其中包括少量已佚的或者明清之际难断代者。另据陈大康所编的《明代小说编年史》著录，明代初期，即弘治以前的小说仅15部，其中还包括一些文言小说和准小说。由此可见，明代的通俗小说90%以上集中在明代中晚期。当然，数量多并不能证明小说的创新性强，很多小说的确是一些经典小说的衍生作品，如明代《西游记》的续书有《续西游记》（无名氏）、《西游补》（董说）等，仿作有《扫魅敦伦东渡记》（方汝浩）、《东游记》（吴元泰）、《南游记》（余象斗）、《北游记》（余象斗）等；《三国演义》的仿作有《列国志传》（余邵鱼）、《新列国志》（冯梦龙）等；《水浒传》的仿作有《杨家府演义》（无名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熊大木）等。这些衍生作品，无庸讳言，有相当部分是雷同之作。文学贵在创新，小说创作也如此，雷同是文学创作的大忌。所以，很多论者因为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对原作十分仰慕，而将衍生作品视为原作的附属品，评价不高，甚至斥之为“东施效颦”、“狗尾续貂”。如清代刘廷玑对续书的评价：

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四大奇书”，如《三国演义》名《三国志》，窃取陈寿史书之名。《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